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的修订与其治学理念

李政君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顾颉刚在1955年出版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是对原书《汉代学术史略》的修订,其修订后的呈现形式不足以证明其学术思想出现了变化。该书的大部分改动只是使语言更为通俗、表述更严谨以及增订了一些知识性的内容,少部分符合时代话语规范的改动也属于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但该书的叙事体系、著述宗旨及对关键问题的解说都没有改变,他依旧将禅让说归于墨家编造,认为传统古史系统定型于王莽篡政时期,而当时的主流学界对此已另有不同解说,这表明其学术思想根基没有转变。但这并不代表顾颉刚反对唯物史观,不反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历史研究是顾颉刚的基本态度,但他坚持历史研究有“下学”与“上达”分工的治学理念,认为自己的“下学”工作与唯物史观的“上达”研究有裨益而无冲突,无需过于强调唯物史观指导。面对当时政治运动的压力,顾颉刚虽作出一些调整,如引用唯物史家的论述,但此时尚未放弃这一理念。《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出版正是他在现实压力下坚持学术思想与治学理念的体现。

关键词: 顾颉刚 《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K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5)04-0152-05

《汉代学术史略》是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开设“秦汉史”的讲义,1935年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1955年修订后,更名为《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据顾颉刚说,后书只对前书“作了一些字句的小修改”[1](“自序”,P12)。而其弟子刘起舒在1986年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中却说“这部书的修订,最具体地和较全面地反映了他思想认识各方面的变化”,是新中国成立后顾颉刚“在思想和学术上的进步”体现[2](P252-257)。顾颉刚与自己学生的说法如此不同,故有必要加以辨析^①。近来有学者提出应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史学^②。对此问题,顾颉刚颇具代表性,至少是较好的参照。《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出版于1955年,也恰在此时期。故本文尝试以该书修订为例,探讨顾颉刚当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及其治学理念。

一、修订内容简析

据刘起舒说,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在

原书基础上“共修改一百多处,其中除少数为技术性者外,大都反映出了他思想认识的提高”[2](P255)。日本学者小仓芳彦也曾专门做过对照表[3](卷二,P577-589),从此表看,该书修订数量虽多,但绝大部分仅限于一般字句的改动,对原书所要表达的主要学术观点并无太大影响。具体见表1。

顾颉刚对《汉代学术史略》的改动基本不出表中六类。前三类改动,占总数十分之七以上,数量虽多,但只是使语言更为白话,表述更为谨慎,以及增补、订正一些具体知识性的内容,若研究1949年后顾颉刚的思想变化,可略之不计。

第四、五类改动中,将汉朝统治者与“民众”剥离,对社会下层避忌用贬义称谓。另外,《汉代学术史略》涉及到“民众”或与之有类似含义的词语时,《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绝大部分也都做了改动。可见,顾颉刚已经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对阶级分析观念的强调。但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涉及“民众”等词语的改动仅十余

收稿日期:2014-02-01

作者简介:李政君(1987-),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学史方向博士研究生。

^①有些学者的著作中对此略有提及,基本采用顾颉刚的说法,但并无详论。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1984年版,第347页;吴少琨、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②参见陈其泰《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2期;《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史学成就》,《当代中国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12年5月;《唯物史观与正确评价新中国史学道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6月19日。

处,却表现出循环互换的特点。例如,既有改“民众”为“人们”,又有改“人民”为“人们”,更有改“民众”为“人民”,显得毫无章法可循。这说明,顾颉刚或者不明白这些词语的具体时代内涵是什么,或者根本就是敷衍了事。因此,书中的改动可能只是一种回避指责的策略,而未见得一定是思想转变的征象。

与之类似的第六类改动表明,顾颉刚也注意到在

20世纪50年代的语境下,“封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阶段、一个社会性质的术语,不可以“错用”。但我们进一步分析会发现,替换“封建”的词语是“旧社会”“旧制度”等指意宽泛的词语,而不是诸如“奴隶制”“宗法制”等指意明确的词语。因此,它同样不能证明刘起舒所说“思想和学术上的进步”。

表1 《汉代学术史略》修订内容分类举例表

序号	类别	汉代学术史略(1935年)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955年)		总数
		内容	页码	内容	页码	
一	一般用词调整	吩咐上代帝王	4	强迫上代帝王	2	41
	表述更为通俗易懂	但的确映现了一个觊觎不安的社会在后头	44	但的确反映了一个动摇不安的社会在后头	30	
二	用词更为精准	阴阳说可说是起源于《周易》,五行说可说是起源于《洪范》	2	阴阳说可说是最先表现于《周易》,五行说可说是最先表现于《洪范》	1	14
	订正原书错误	古文经	157	今文经	107	
三	修改知识、年代、地名等以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到现在中央研究院的正式发掘,已发现了三万片以上	73	到近年考古学者大规模的发掘,已发现了十六万多片	51	10
		到今不过三十年	91	到今不过五十年	62	
		北平	175	北京	120	
四	注意到阶级分析观念及“人民”等词的阶级性	当时民众们	21	当时统治阶级以及受着统治阶级麻醉了的人们	15	16
		人民八千余人	124	附和的八千余人	84	
五	对社会下层避忌用贬义词语	张角造反	83	张角起义	57	6
		蛮夷	122	夷族	83	
六	避免使用“封建”等涉及社会性质、历史阶段的词语。	毁灭封建组织	50	破坏世族专政	34	2
		这偶像直维持到现在。所以战国之末虽已把封建制度打破,而封建思想还由儒家传了下来	72	这偶像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所以战国之末虽已把旧制度一齐打破,而旧思想还由儒家传了下来	50	

表注:

1. 表中《汉代学术史略》为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版,《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
2. 为便于统计,本表中“总数”栏以小仓芳彦《改订之处原文对照表》(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577-589页)为准,每一横栏算做一处改动。限于篇幅,每类仅举几例,其它可参见《改订之处原文对照表》。
3. 刘起舒使用底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该版在1955年版基础上又有修订,故统计数据与本表稍有差异。因1978年版与本文讨论问题关系不大,故未涉及。

再有,后三类改动虽然表明顾颉刚修订《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时,确实有使文字表述符合当时话语规范的举动,他注意到应用关乎阶级分野的概念,对“封建”“民众”“群众”等许多词语都做了改动。但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而并非顾颉刚个人特例。无论顾颉刚的思想如何,他若刊行著述,都必须在行文表述上作出与现实时代的特定回应。正因如此,我们不应仅就后书表面上的改动来判断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不变的著述主旨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出版时增加了一篇《序》。在序文中,顾颉刚提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导,并在篇末进行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的研究不合乎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1](《序》,P14-15)。刘起舒也将此作为顾颉刚思想变化的重要根据。但这些自我批评,实际上并没有体现在本书正文中,该书还是保持了其原有的特点。

本书通过论述“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怎样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为秦、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集团服

务”来说明“‘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是由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为了适应于当时统治者的不同阶段的需要,用五德终始说来编排的各种古史系统而形成的”[4](P13-14),具有鲜明主旨与叙事线索。这在该书修订之后并无变化。

以顾颉刚严谨的治学态度看,若该书内容主旨出现重要改变,理应在标题中有所体现。两书相较,各章的标题只字未改,修订后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还是保持着原书的体系。在修订后的序文中,顾颉刚仍指出:本书意在说明“在阴阳家和方士的气氛下成就的秦、汉时代若干种政治制度”;“博士和儒生怎样地由分

而合,又怎样地接受了阴阳家和方士的一套,成为汉代的经学,又怎样地从他们的鼓吹里影响到两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汉代的经学如何转入谶纬,谶纬对于政治又发生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暴露了汉代思想的黑暗面”[1](《序》,P10)。在该书正文中,他也依然坚持“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这一千九百余年来的搅乱古书和古史的总账”[1](P112)。可见,《汉代学术史略》和修订后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都坚持一贯的学术诉求。

更为重要者,将尧舜禅让传说归于战国墨家的编造,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系统,乃是王莽篡政时期定型下来的,这是顾颉刚1949年之前的一贯见解^①。20世纪50年代,这些看法已经大为边缘化,而另有不同的主流解说,例如对于尧舜禅让,就解释为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部落民主制。但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中,顾颉刚对以前的观点并未改变,第九章、第十四章都畅言墨家造作了上古“禅让”之说,特别是第十六章《古史系统的大整理》,坚持原书所有见解,文字也极少改动,指出“后来王莽在政治上固然失败,但这个杜撰的古史系统却已立于不败之地……谁会想到这是王莽骗局的遗留?”[1](P102)。毫无疑问,他还是执着地坚持其疑古考辨的治学思路。

因此,再多的词句和表述方式的改动,都不足以证明顾颉刚学术思想根基有所转变。即使新写的序言内有自我批评的语句,也同样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篇序完全可以看作是顾颉刚“用心设计”出来的。从《顾颉刚日记》来看,他修订本书正文、校对清样,集中于1954年10月至11月间。此后至1955年3月,主要在“重草”“重作”“重写”“修改”本书序文。其间,至少主动与四人讨论过该序,包括专门请李平心提意见[5](第七卷,P605-664)。相对于该书正文修订,顾颉刚显然更重视如何恰当地书写序文。事实上,他在《序》中也确实有意回避了当时对自己不利的一些事实,如“只字不提实验主义的影响和胡适名字”[6](P24)。正因这种如履薄冰的谨慎和对当时敏感问题的回避,我们说这篇《序》是顾颉刚“用心设计”的,其中自我批评的语句并非出自真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言不由衷的表述。

今天看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序言,其实主要叙述作者自己通过长期研讨形成一系列学术见解的历程,说明他是如何发现汉代方士和儒生搅乱了经学和历史。至于说“我在这书里,为了憎恨当时的统治集团的行为,过分地强调它的黑暗面”[1](《序》,P15)之

类的自我批评,实在是无足轻重的点缀,并不能证明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根基有所转变。诚如他自己在1954年所说“一人之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7](卷三,P391)

三、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

既然该书修订内容本身不能证明刘起舒所说的“进步”,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又坚持了原书的思想主旨,这是不是意味着顾颉刚排斥唯物史观?或者说,他对唯物史观抱持何种态度?^②其实,这一时期顾颉刚在学术上最悉心思考的问题并不是怎样附和或排斥唯物史观,而是怎样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并能公开发布。

政治上顾颉刚对共产党和新中国政权并无刻意抵制,这从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例如,1949年6月9日,他写道“听陈市长毅讲话,态度极好,知反共者直是多事,我辈为国民党蒙蔽处太多矣。”[5](第六卷,P470)这至少表明,到解放前夕顾颉刚对共产党和新政权的态度并无根本排斥。只是从复旦大学几次聘请与他辞聘、应聘看,当时的顾颉刚仍认为择业自由,尚未意识到组织的强大影响[5](第六卷,P534;第七卷,P70、193、285)[8](卷六,P431)。

学术上顾颉刚也不抵触唯物史观。早在1933年他就说过“我自己绝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卷一,P124)在当时,作为非共产党内的历史学家,能够有这样的声明,实为难能可贵。按此逻辑,1949年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思想、接受唯物史观,对顾颉刚而言应当并非困难之事。

但是,顾颉刚具有自己的治学理念。他接着说道:“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他称考辨古书、古史的工作为“下学”,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为“上达”,并说“下学”根柢打好,“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了。是则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3](卷一,P124、P125)其言外之意是不必在考辨古书、古史真伪等问题上过分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相反,古史考证、史料辨伪倒可以给唯物史观提供帮助。无论如何,历史学者的共同底线是求真。

“下学”与“上达”的关系,正是顾颉刚对待唯物史

^① 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1930年)、《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1936年)两文,分别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第249-445页、卷一第423-498页。

^② 此处需说明,本文以1955年《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出版为大体时间下限,顾颉刚在此之后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不在讨论范围内。尤学工曾专门探讨过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见氏著《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史学史研究》2013年第4期。

观的基本态度,他对此一直坚持。例如,1951年他就《尚书》今译工作曾说“如果有人看了我的工作,笑我不合时宜,弄这陈旧的一套,我请诵恩格斯的两句名言:即令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的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数年静心研究的科学事业……只有多数经过批判的选择与全部静心研究过的历史史料,才能解决这样一个课题。目前正在争论西周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我把《尚书》彻底翻译出来,即是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史中的一个课题供给确定可靠的材料呵!”[9](P402)显然,顾颉刚是借恩格斯的话证明考辨古书、古史工作的正当性,及其对解决当时重大史学问题的基础价值。

他也“识时务”地引用一些当时知名唯物史家的论述,但同样是为证明古史考证、史料辨伪的重要性。例如1955年《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一文,第一段便写道“郭沫若先生说‘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出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加有害。’”之后,他叙述了我国“辨伪学”的发展史,直言古籍考辨在我国旧有学术中富于“科学性”,“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优秀遗产”,“绝不容割断”[3](卷七,P22、29-30)。可见,顾颉刚无论是引用恩格斯还是郭沫若的话,目的只是证明自己“下学”工作的正当性及其对唯物史观“上达”研究的基础价值,但并没有用唯物史观指导自己“下学”工作的意思。正如许冠三指出,在当时政治环境下,顾颉刚也“引用一些恩格斯、马克思的语句作护符”[10](P220-221)。

综上所述,不反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历史研究是顾颉刚的基本态度。但是他坚持历史研究中“下学”与“上达”的分工,认为考辨古书、古史的“下学”与唯物史观的“上达”有裨益而无冲突,不必过于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这是顾颉刚在历史研究中秉持的治学理念。

刘起舒坚持称顾颉刚思想和学术上所谓“进步”,应该和《顾颉刚先生学述》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该书写于1981至1983年间,刘起舒坦言道“对老师学术用几句赞誉之词,应是情理所许可的。”[2](“后记”,P381)而当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最好的“赞誉”莫过于表扬其“进步”。因此,他对此问题的述评,与其当作学术结论,不如看作思想材料。

四、《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的出版

基于上述治学理念,顾颉刚看似具有了继续从事古书、古史考辨工作的理由,但当他治学取向明显不符合于主流的观念与论点时,他还是会因此付出或被围攻、或被冷落的代价。如1951年7月,中国史学会成立

大会不被邀请,12月却被“催迫”参加“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1952年,学术上被自己的学生童书业、杨向奎批判;1954年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后,学术热情屡遭冷遇,并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等运动中连受冲击[9](P394-419)。实际遭遇与治学理念明显存在反差,能否坚持一贯的治学理念便成了摆在顾颉刚面前的现实问题。

顾颉刚既然觉得自己的研究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研究有裨益、不冲突,当然不愿接受自己治史路径受到严重排斥和冷落的情况,对来自行政方面的压力尤其不满[11](P240-264)。在他对自己这一时期心情的记述中,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面对当时的政治运动表现出的无可奈何情绪。1952年,听李琦训话后,在日记中批评道“阎王好见,小鬼难当,奈何!”[5](第七卷,P259)1953年,他抱怨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与……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执行之干部,以其文化程度之浅,过于急功,但要人作一个速成的教条主义者,其为违背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宁可言耶!”[7](卷三,P370-371)类似的表述在其日记、书信中多处可见。仅就此看,顾颉刚的矛头所指是政治运动的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换言之,不论顾颉刚是否了解这些运动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此时令他反感的只是开展政治运动的方法和技术问题,而不是运动本身。正是这种主观认可与实际遭遇的反差,才造成了他内心的纠结与无可奈何。

第二,顾颉刚就童书业、杨向奎二人在《文史哲》上发文批判“古史辨”问题,给王树民的复函写道“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是可以原谅者也。”[7](卷三,P391)可以说,“应付”正是顾颉刚自己对待政治运动在上述无可奈何心态下的选择。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正是在这种环境和心态下修订的。当时为什么要修订此书?可从本书内容、见解和写作特点来分析。其一,本书的内容和见解,在顾颉刚学术思想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揭出汉代经学、史学都被方士和儒生淆乱,古史系统是王莽为了篡政需要而拼凑、定型,就在整体上摧毁了“信古”派的学术堡垒。正如本书第十一章呼吁“奉劝研究古学的人们,大可不必再做‘汉人近古,其言必有所据’的好梦了!”[1](P65)而且本书文笔生动,饱含热情与感染力,并无艰涩的考证语句,而论据又十分充沛,这也有利于扩大影响,宣传自己的学术理念。其二,本书指出投靠政权的方士、儒生,为了私利而迎合统治者政治需要,不惜篡改经典、造作古史系统,这在根本上也符合当时提倡的阶级斗争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顾颉刚

修订此书,乃是学术执著精神与“识时务”的理性策略相结合的举动。但他本人对此仍有忧虑,1955年3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秦汉方士与儒生》,今出版矣。看舆论如何,如多抨击,则予写作生涯将从此搁笔矣乎?”[5](第七卷,P671)可庆幸的是本书并未遭到围攻,这多少增强了顾颉刚的信心,其治学理念依旧坚持了下来。

五、结论

与《汉代学术史略》相比,《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确实存在一些词句和表述方式的改动。但是,其中很大部分只是使语言更为白话、语气更为谨慎和具体知识更为准确。有一些改动关涉当时的话语规范,如历史分期、阶级分野等问题,但这是当时学界的普遍现象,顾颉刚若刊行著述,就必须在行文表述上作出对现实时代的特定回应。因此,仅以此为据,我们不能判断顾颉刚的思想是否出现了转变。本书的叙事体系、根本

宗旨和对关键问题如禅让传说、王莽篡汉的解说等都没有改变,而这些说法已明显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解释。因此我们可以说,1955年该书再版之时,顾颉刚的学术思想根基没有改变。

顾颉刚并不反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历史研究,这是他的基本态度。但他坚持历史研究有“下学”与“上达”分工的治学理念,认为自己的“下学”工作不与唯物史观的“上达”冲突,反而对其有益,无需过于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这是顾颉刚秉持的治学理念。在当时,这一理念显然不合时宜。面对现实的压力,顾颉刚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如在著作中引用一些“经典”语句、唯物史家的论述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治学理念。《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正是他在现实压力下坚持自己学术思想与治学理念的体现。至于此后顾颉刚的学术理念是否出现变化,已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 考 文 献

- [1]顾颉刚.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 上海:群联出版社, 1955.
- [2]刘起舒. 顾颉刚先生学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 [3]顾颉刚.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4]王熙华.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前言[A]. 顾颉刚.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5]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Z].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7.
- [6]王学典. 痛苦的人格分裂——五十年代初期的史界传统学人[J]. 读书, 1995(5).
- [7]顾颉刚. 顾颉刚书信集[Z].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8]顾颉刚. 顾颉刚自述书[A]. 宝树园文存[C].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9]顾潮. 顾颉刚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 2011.
- [10]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 长沙:岳麓书社, 2003.
- [11]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陈朝云)

On the Revision of Handai Xueshu Shilue and the Academic Ideas of Gu Jiegang

LI Zheng-jun

(History Colle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Qinhua Fangshi He Rusheng, published by Gu Jiegang in 1995, was a revision of his Handai Xueshu Shilue. The language has been more popular and the expression more rigorous, together with a small number of changes of discourse specification. In Gu's theor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n guide historical research, which has a precise division of "Shangda" and "Xiaxue", and he sticks to the idea that his "Xiaxue" research is quite complementary with "Shangda" research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Gu Jiegang; Handai Xueshu Shilue; Qinhua Fangshi He Rushe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